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邓翔 姜洋 等著

经济转型期 中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 及其影响



科学出版社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消费 储蓄行为及其影响

邓 翔 姜 洋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千百万个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仅占据着宏观经济分析的中心位置,也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钥匙。本书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出发,利用微观家庭数据和历史数据,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收入分配以及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探讨了居民的资产财富效应、消费的理性行为,最后进一步研究了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宏观经济意义。本书以当代消费理论为视角,深入浅出地研究分析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及其宏观经济影响。

本书适合于从事经济分析的管理者、研究者,以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型期中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及其影响/邓翔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ISBN 978-7-03-042117-8

I. ①经… II. ①邓… III. ①经济转型期-居民消费-研究-中国 ②经济转型期-居民储蓄-研究-中国 IV. ①F126.1 ②F83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993 号

责任编辑:李 莉 / 责任校对:张怡君
责任印制:霍 兵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字数:242 000

定价: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千百万个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仅占据着宏观经济分析的中心位置，也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钥匙。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和政策变动，理解并探究转型期间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将对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变动及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波动。社会资源是通过家庭在给定的生产要素收益率和其他约束条件下，实现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配置，这种配置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长期增长潜力。在波动方面，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60%左右，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因此，不理解消费的决定因素，就不可能理解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也不可能理解缓和经济波动的方式；同时，如果要分析政府支出、技术变动、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总产量，那么必须首先理解消费和储蓄是如何决定的。

第二，将能更好地揭示我国居民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之谜，预测未来居民储蓄率的变动。中国居民储蓄的超常增长近年来成为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据 Modigliani (2004) 计算，1953~1978 年我国平均家庭储蓄率低于5%，而1979~2000 年则高达23.28%。这与同期个人储蓄率在世界范围内的下降以及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非常低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有助于揭示和理解长期以来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长期下降趋势，消费增长率也有显著的降低。消费需求的相对疲软直接危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第四，有助于分析和预测政府的各项改革和政策效应，并为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模型打下基础。研究经济转型期家庭层面和总体层面的消费行为和演变规律将放弃代表性消费者假设，重视异质个体行为的加总和消费、财富的分布状况，从而有利于研究政府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改革举措及其政策影响。另外，本书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也将为建立我国的宏观消费函数理论，进一步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模型打下基础。

但要揭示和完成上述研究任务的确有非常大的难度，这不仅需要理论方法的准备，同时还需要大量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撑，否则将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消费和储蓄问题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非常活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包括陈宗胜、藏旭恒、钱颖一都在该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伴随消费理论的新进展，以及微观数据库的出现，许多年轻的学者也在该领域作出新的贡献，包

括魏尚进、郭凯、张晓波等的近期研究。但与国际前沿同类研究相比，对中国的研究仍显示出不足，其中主要的障碍在于缺少完善的、质量较好的家庭微观消费、储蓄的数据。

笔者是在2004年左右开始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特别是在2004年9月，由于得到了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和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笔者可以非常自由地在波士顿剑桥的MIT和哈佛大学经济系听取各种讲座，特别是笔者选择了当时哈佛经济系教授Nicola Fuchs-Schündeln（现为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家庭和厂商行为的总量影响”的前沿课程，其对前沿领域的梳理给了笔者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她利用“两德统一”这一“自然实验”的家庭微观数据分析给予笔者很大启发，使得笔者更坚定了继续从事该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将新的方法用于中国转型期的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分析中。但随着研究的开展，发现该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其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无法获得我国家庭的消费、储蓄和资产等面板数据，只能借助于其他机构的分段的调查数据和总量数据。此外，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宏观总量的微观基础问题，强调家庭和厂商的“异质性”问题，对“代表性行为主体”的传统假定提出了质疑，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异常活跃、激动人心，但也对笔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尽管如此，笔者仍和研究生一道毫不犹豫地在该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开垦”。本书基本上是笔者和学生的合作成果，特别是与目前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研发部的姜洋博士的合作成果。笔者主要希望利用现有的消费储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包括对转型期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特征的分析，利用中国的数据对主要消费理论的检验；对转型期中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检验；对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对消费的影响的分析；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的分析等。

本书的写作是按照如下的分工完成的：邓翔、姜洋负责全书框架的构思；邓翔、姜洋负责编写第1章、第2章；姜洋、邓翔负责编写第3章；邓翔、杜海韬、李锴负责编写第4章；姜洋、邓翔负责编写第5章；姜洋、邓翔负责编写第6章；林霞、姜洋负责编写第7章；郭锐、邓翔负责编写第8章；邓翔、姜洋负责编写第9章、第10章。

由于研究条件和作者水平的限制，本书尚有很多方面仍需加深和完善，不足之处也期待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华夏英才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号：71173149和71473169）。

邓翔

2014年于成都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国内外消费储蓄的研究状况	1
1.2 我国消费储蓄问题研究的意义	4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10
第 2 章 消费理论的发展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判断	14
2.1 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	14
2.2 转型时期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35
2.3 本章小结	47
第 3 章 收入与消费	49
3.1 引言	49
3.2 理论模型和数据说明	52
3.3 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和设定	54
3.4 实证结果和分析	62
3.5 本章小结	67
第 4 章 不确定与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行为	69
4.1 引言	70
4.2 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下的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实证	74
4.3 本章小结	98
第 5 章 收入分配与城乡居民消费	101
5.1 引言	102
5.2 理论分析	103
5.3 实证检验	106
5.4 作用机制	110
5.5 本章小结	117
第 6 章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	118
6.1 引言	119
6.2 理论模型和数据	122
6.3 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	125
6.4 本章小结	130

第 7 章 财富效应：资产与居民消费行为	132
7.1 引言	132
7.2 中国股市、房市具有财富效应吗？——理论的解释	138
7.3 中国股市、房市是否具有财富效应：京沪深城镇数据的验证	139
7.4 本章小结	142
第 8 章 消费者理性行为的验证	144
8.1 引言	144
8.2 理性博彩者组成的 Lotto 市场：一个古典模型	146
8.3 经验反驳	148
8.4 进一步讨论	151
8.5 本章小结	154
第 9 章 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156
9.1 居民消费的总量经济效应	156
9.2 中国居民消费的总量特征判断	159
9.3 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消费总量效应的实证	162
9.4 本章小结	164
第 10 章 主要结论	166
10.1 主要判断	166
10.2 政策含义	169
10.3 进一步的研究	173
参考文献	174

第1章 导 论

1.1 国内外消费储蓄的研究状况

消费^①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人们通过消费可以获得效用的满足，这种满足不仅局限于当前，也包括未来，人们为获得未来消费的支出从而选择储蓄^②。因此对于居民而言，消费和储蓄构成了其跨期消费选择的两个方面。居民当期消费的加总形成总的消费需求，而总的储蓄进而转化为总投资。消费和储蓄问题对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波动而言，由于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是怎样影响总产出的，就必须清楚消费的决定方式；就长期增长而言，社会资源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配置是决定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不难理解，消费和储蓄问题长期处于宏观经济研究的中心。

1. 国外消费储蓄理论的研究进展

尽管古典的经济学家也有大量对消费问题的论述，而开拓式的奠基应肇始于凯恩斯。凯恩斯将其消费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大厦的支柱，由该理论进一步推演出政府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但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创造性破坏”中前进的，由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无法解释“库兹涅茨”之谜，20世纪50年代的莫迪利安尼和弗利德曼各自从消费者选择理性出发，提出“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 LCH）和“持久收入理论”（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后来，两位学者正是由于这一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在概念、分析重点方面存在差异，但本质上还是费雪的“跨期抉择理论”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消费理论研究，都是以消费者跨期选择为基础。只是在理论上，经济学家们用现代的数学方法包装了原有的模型，提出以欧拉方程为核心的现代生命周

① 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消费的界定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总消费，它等于居民消费支出加上政府消费支出；二是“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前者是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包括衣食、耐用品、住房、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支出，后者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② 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总储蓄的界定是：可支配总收入用于最终消费后的余额。各部门的总储蓄之和称为国民总储蓄

期模型；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又利用大量的消费数据验证已有的假说，得到家庭消费和总量消费的典型特征。但随后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对当时的消费理论大厦产生了破坏，一个是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理论”，另一个是霍尔（Hall，1978）的消费“随机游走模型”。新的挑战包括对预期和不确定性的重视，以及消费对可预期收入和不可预期收入的反应的追寻。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个体与总体经济层次上的消费和储蓄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国外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防性储蓄或“缓冲存货”储蓄模型的出现。学者们不断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简称 LC-PIH）的标准形式进行修正和扩展，通过放弃效用函数二次型假设，引入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Carroll，1992）率先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缓冲存货（buffer-stock saving）和预防性储蓄模型（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典型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行为（Carroll and Samwick，1997；Ludvigson and Michaelides，2001；Gourinchas and Parker，2001；Kennickell and Lusardi，2004）。

第二，求解方法上从欧拉方程的线性近似估计向数值模拟转变。自霍尔（Hall，1978）首次推导出消费的欧拉方程以来，欧拉方程估计就一直主导了关于消费问题的经验研究，但即使使用高质量的家庭数据，关于预防性动机强度的估计也是不一致的。卡罗尔（2001）以及 Ludvigson 和 Paxson（2001）等证明了对非线性的消费欧拉方程做线性近似估计会得到一个下偏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ρ 值。造成 ρ 估计下偏的原因是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相关的高阶项在线性近似中被忽略，进入残差项，因此无论用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法（IV）还是广义矩法（GMM）估计，都无法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最新的研究（Ludvigson and Michaelides，2011）主要采用数值法来做相关模拟，以解决近似偏误问题。

第三，在数据的使用上倾向于采用大样本微观家庭数据。过去大量研究都是直接将总量时间序列数据应用于个体消费行为模型。但随着大样本家庭数据库的开发和完善以及微观分析技术的发展，关于消费和储蓄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宏观数据分析转向包含丰富个体信息的微观数据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Carroll and Samwick，1998 年；Kennickell and Lusardi，2004 年；Parker and Preston，2005 年）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等权威统计部门所做的大样本家庭面板数据（panel data），极大地推动了消费理论的发展。

第四，从代表性消费者（representative consumer）模型向研究异质个体行为及其加总方式转变。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严格假设个体行为与平均或总体行为类

似。正如迪顿（1992年）指出的那样，代表性消费者概念的缺陷有两点，“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的生命太长”。卡罗尔（2000年）也指出，由众多异质个体组成的经济体的总消费行为只有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才能用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加以解释，即个体必须能对异质冲击进行完全保险，否则未保险的异质风险会造成消费策略函数的非线性，从而使代表性消费者加总不可行。因此，Aiyagari（1994年）等学者开始放弃代表性消费者概念，重视个体行为加总方式的研究。卡罗尔（2000年）以及Ludvigson和Michaelides（2001）等的研究表明，异质的个体消费者的总量行为，可以较好地解释总量数据的“过度平滑”和“过度敏感”现象。

第五，更加重视“自然实验”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效应分析。Fuchs-Schündeln（2004）以及Browning和Collado（2001）等学者充分地利用了现实中的税收、福利制度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变动等“自然实验”机会，分析了居民在这些“自然实验”中的行为变动，以此验证各种消费理论，揭示政府的宏观政策效应。本书主要成员哈佛大学经济系的Fuchs-Schündeln教授就成功地利用德国统一的“自然实验”，验证各种消费理论的有效性，分析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自我选择问题。

2. 国内消费储蓄理论的研究进展

与西方消费储蓄理论的研究相比，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晚。但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几本关于收入分配和消费问题的重要著作。第一本是南开大学的陈宗胜的《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1991年），该书以现代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对我国收入分配扩大问题进行了剖析；第二本著作是山东大学的藏旭恒，其专著《中国消费函数分析》（1994年），是国内最早利用现代消费理论对中国消费问题进行解释的著作，随后，藏旭恒及其研究团队还陆续推动了中国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的研究。此外，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外国学者也对中国消费储蓄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探索，代表性成果是，秦朵（1990）和Feldenstein等（1990）的研究。他们用现代消费理论的方法，分别探究了收入水平、价格、利率等因素对我国消费储蓄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新思想、新方法的刺激，再加上新的数据，特别是微观数据的获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消费储蓄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贺菊煌（2000）将生命周期函数纳入宏观经济系统中，研究宏观意义下的生命周期消费函数理论；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选择城镇居民1991~1998年的板块数据，用迪南（Dynan，1993）模型测定中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强度。万广华（2001）综合考虑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用全国总体数据对消费函数进

行估计。孙凤（2001）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生命周期假说，使用误差修正模型，从短期和长期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收支状况进行研究。申朴和刘康兵（2003）通过对 Campbell 和 Mankiw 消费过度敏感性模型的扩展，分析了转型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田岗（2004）将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起来，推导出一个包含流动性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并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施建淮（2004）对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作出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并非如预期的强。杜海韬、邓翔分别利用曼昆和坎贝尔（Campbell and Mankiw, 1989 年）以及卡罗尔和萨姆维克（Carroll and Samwick, 1998 年）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问题和农村居民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的消费行为。郭凯等对中国的私人储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的消费并不是特例（Guo and Papa N'Diaye, 2010）。

从这些新近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储蓄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与国际主流研究范式接近。例如，魏尚进和张晓波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私人储蓄率的攀升是由于中国男女比例的失调，是由于父母的竞争性储蓄动机及其外溢影响而形成的（Wei and Zhang, 2009）；徐舒和赵绍阳（2013）建立了一个异质性经济人的生命周期模型以刻画经济个体的动态消费决策，进而采用似然矩方法估计出模型的结构参数。

1.2 我国消费储蓄问题研究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及其宏观总量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对中国消费问题的分析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透彻地理解这些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1. 有助于揭示我国居民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之谜

据莫迪里安尼（2004 年）的计算，1953～1978 年我国平均家庭储蓄率低于 5%，而 1979～2000 年则高达 23.28%。这与同期个人储蓄率在世界范围内的下降以及我国人均收入还非常低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学术界对此的解释仍莫衷一是。尽管魏尚进和张晓波等指出竞争性储蓄行为能够解释 2000 年之后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趋势，但之前的高储蓄率以及持续的增长仍难以解释。而现有消费储蓄理论仍是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假定推演的，但正如卡罗尔（2000 年）在“代表性消费者的安魂曲”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以“代表性消费者”所推导的总量模型不具备微观基础，这些模型既无法解释微观的财富的偏斜分布，也无法

解释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MPC)，因而，以此为基础模型也难以阐明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增长。

2. 有助于揭示消费与投资需求长期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长期下降趋势，消费增长率也有显著的降低。消费需求的相对疲软直接危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成为限制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最终消费率在 2010 年下降到 47.4%，居民消费率在 2010 年也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的 33.8%。消费和投资是国内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消费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过剩。图 1-1 展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从 1990 年的 48.8% 下降到 2010 年的 33.8%，年均下降 0.75%）；投资率的持续走高（从 1990 年的 34.9% 增加到 2010 年的 48.6%，年均增长 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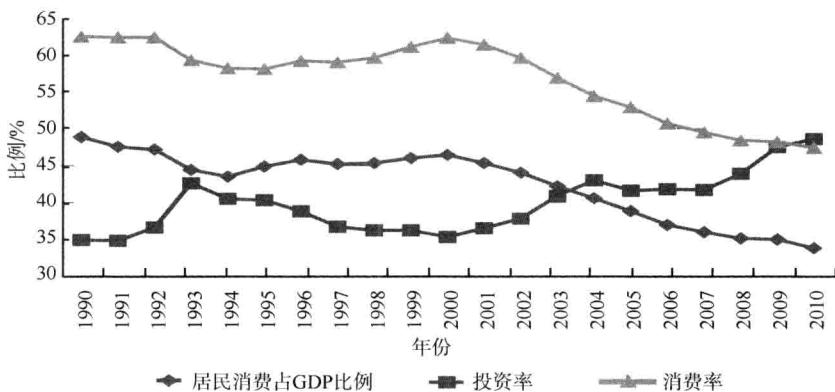


图 1-1 1990~2010 年中国的消费、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93~2004 年高收入国家消费率为 78.4%，中等收入国家为 73.5%，低收入国家为 81.2%；相对应的投资率分别为 21.3%、26%、21.5%；而我国 2010 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 48.6% 和 47.4%，相比于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已显得严重失调^①。图 1-2 显示部分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

正是因为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内需的持续“疲软”使得消费问题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长期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热度”或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不会消退。从这一层面上讲，解决消费问题是解决当前我国内

^①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统计研究，(3)：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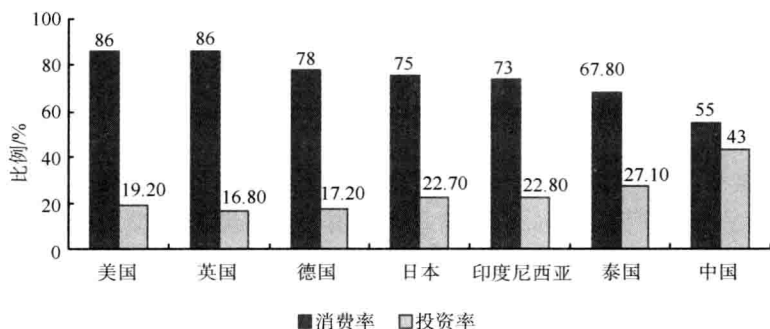


图 1-2 2005 年世界主要国家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

外需不平衡、内需不足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

3. 急剧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影响着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异

现有的消费储蓄理论分析中对结构行为参数的识别非常关键，而这些参数的大小却因个体所处的环境不同而不同，这些环境包括不同的制度背景、文化、地理和历史等因素 (Attanasio, 2009)。但一般来讲，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往往套用制度和环境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的假定，但由此带来的偏误估计却是巨大的。这也是现有的消费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问题的原因之一。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应无视这样的变化，相反，研究应该置于这些变化的背景之下进行。

真正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在于消费动机。消费动机的强弱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社会习俗、过去的经验、未来的期望、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等^①（详细的消费者影响因素分析见图 1-3），因此只有透视居民消费动机的形成才能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作出完全的解释；另外，理论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不同，也即社会经济体制背景存在差异。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是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体制变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等）因素并不是模型的直接变量，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面对的转型条件下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起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更不能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

与发达国家相比，微观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社会、体制等因素相差甚远。例如，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居民面对的不确定预期较小，居民可以

^① 金晓彤，杨晓东. 2004.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四个假说即期理论分析. 管理世界, (11): 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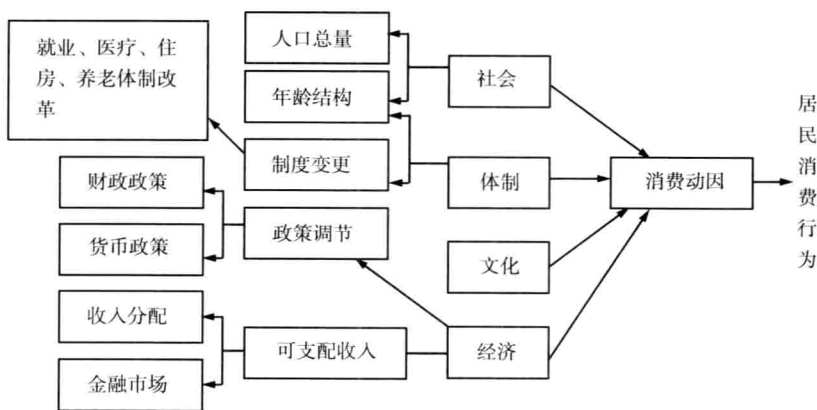


图 1-3 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素

维持其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模式；而转型时期的中国，居民不得不将当期收入大量用于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就外部金融市场而言，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借贷约束也较低，居民可以利用借款平滑消费，因此储蓄不需要过多，而当借贷市场发展滞后，或者人们还没有习惯通过借款平滑消费，或者没有相应的金融市场支持，人们必然会保持高储蓄率和节俭的低消费特征。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导致中外“代表性消费者”在消费动机上的结构性差异，所以有必要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入手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概括地讲，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制度的迅速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

经济转型时期对居民消费的最大影响就是“不确定性预期”。1978年，我国开启了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以承认决策者的利益和权利以及进行帕雷托改进为前提。

在居民收入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过去终身制的就业方式、政府多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等，使得消费者面临着高度不稳定的收入预期。

在居民支出方面，在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时期，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领域已经或正在进行着“国退民进”式的体制变更，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比1978年改革之前要高得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必会提高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

在金融支持方面，金融体制改革丰富了居民的投资方式，使得居民对货币的时间价值更加敏感，在跨期消费之间的选择更加趋于理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居民面对着远比计划经济时多得多的选择，当然也包括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消

费选择行为更趋向于自由和理性,对收入、风险预期、利率、金融工具的反应也更逼近于收益最大化目标函数。如果居民没有流动性约束的制约,即使存在不确定性预期,也可以在应急性或大宗消费上采取借贷的方式进行平滑,但是转型时期中国借贷体系不健全、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使得这种平滑无法进行,更进一步加剧了体制变迁过程中引致的不确定预期。

用消费理论来表述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存在预防性储蓄,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居民因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储蓄必然高于西方国家。

2) 转型时期收入分配的失衡弱化了居民总体的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但区域发展的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尤其是东西部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007年上海年人均消费24260元,贵州为4057元,差距接近6倍。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49上升到2013年的0.481^①,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指出,中国2012年12月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61,其中,城镇家庭为0.58,农村家庭为0.61。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了2.2^②。过大的收入差距将国民财富中的大多数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中,而低收入群体由于受“流动性约束”,无钱消费,进而降低了社会总体边际消费倾向。

转型时期的收入差距不完全是由市场化改革形成的,而相当部分是因政策和制度设定导致的。过多的行政干预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迫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实际上,正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垄断,以及背后的寻租孕育了越来越多的富有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分流却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选择的影响

1978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以政府主导为特征,政府拥有数量庞大的资源,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从1990年的10%和11%上升到2007年的19%和21%;与1978年相比,2007年政府消费增长了73倍,而同期居民消费的增长为52倍。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拥有和集中型配置可能对居民行为产生抑制或是互补的效应,这种效应也直接决定了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有效性。

首先,经过近20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公用基础设施面貌已极

^① 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对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来源于程永宏,2007,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4);2013年的基尼系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② 甘犁,2012,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改善,在该领域继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空间已相对减小,以此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不仅会加大财政压力,而且其预期效应也有待评估。其次,政府支出和补贴过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对民营经济支持不足,就业拉动有限。政府各项投资计划(特别是“四万亿”投资计划)主要依托国有企业进行,民间资本参与的空间较小。2009年上半年的实施情况表明,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投资项目大部分进入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溢出效用不足。例如,2009年上半年浙江省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同比增长31.6%,民间投资仅增长10.4%,仅靠国有企业的投资拉动经济,将面临独木难支的困难境地^①。最后,政策性补贴短期性特征明显,且拉动内需的作用存在递减趋势。这是因为在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有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居民会加快消费,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此类补贴政策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刺激效果比较明显;但是随着支出的进一步实施,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趋于饱和,余下的居民家庭即使有消费愿望,也无消费能力,此时消费补贴政策的作用就会趋于下降。例如,2008年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在2009年6月销售额达到高峰值88亿元之后连续下降,在当年9月已经下降到60亿元^②。

4) 居民资产的变化与消费行为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住房的商品化的提速,我国居民的财富形式和积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总市值已和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相当;就住房投资而言,住房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在2000年后全面超过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年均4.7%的比例^③。2010年,中国家庭总净资产为69.1万亿美元,美国家庭总净资产为57.1万亿美元,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同时中国家庭住房的自有率已经高达89.68%,远高出美国的65%、日本的60%和世界平均水平的63%^④。家庭资产的迅速变化和膨胀对消费会产生何种影响,其财富效应究竟有多大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此外,从时间跨度和地区差异上看,在转型时期的不同阶段,城乡和地区间的居民消费行为也存在较大差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崛起、衰落和变异,意识和思想观念也在不断碰撞、荡涤和重塑,这些无疑都影响着消费者及其行为。尤其在1992年之后陆续

① 何孝星,邱杨茜.2009.关于当前我国内需刺激的可持续性及其改进问题.经济动态,(11):16-21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家电下乡网

③ 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住房投资占GDP比例一直维持在3%~6%,均值为4.7%,数据来源于CEIC,BooImberg,招商证券研究中心

④ 甘犁.2012.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开始的工资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保障和国企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正是基于此,一个能够更好地描述并解释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跨度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参数可能更适用于中国的消费行为研究。

综上所述,消费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及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有的消费理论仍以代表性消费者为微观基础,旨在寻找影响消费行为的各项因素,但其局限在于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呈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征,消费函数的假设前提已经发生变化,因此现有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仍难有新的突破。在实证方法上,国内相当数量的研究是直接利用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先验性地提出决定消费的有关变量,然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增加或减少一些变量,直到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止。这里实际上已经先入为主地承认了运用回归分析的假定前提,这种“拿来主义”方式忽视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实际,其结果难以准确地解释现实,也无法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使用了修正的方法,在数据选择上大多选择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样本容量有限,直接影响了实证分析的说服力。因此,一个更为可信的方法是,建立基于中国消费者行为基础之上的消费函数,同时利用中国城乡居民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验证。

本书力图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系统研究。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跟踪消费储蓄理论的前沿研究成果,并充分考虑中国居民消费的整体背景的差异及变迁,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分析中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及其影响;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几个主要因素对消费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第一步,梳理消费储蓄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新的发展,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初步判断和分析。

第二步,验证消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收入变量对消费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步,基于新古典消费理论中跨期最优消费模型的假设,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储蓄产生重要影响的若干变量进行专题研究,包括:研究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收入分配失衡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研究政府支出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析股票、房地产市场是否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产生财富效应。

第四步,利用消费理论最新发展阶段的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消费行为理论,